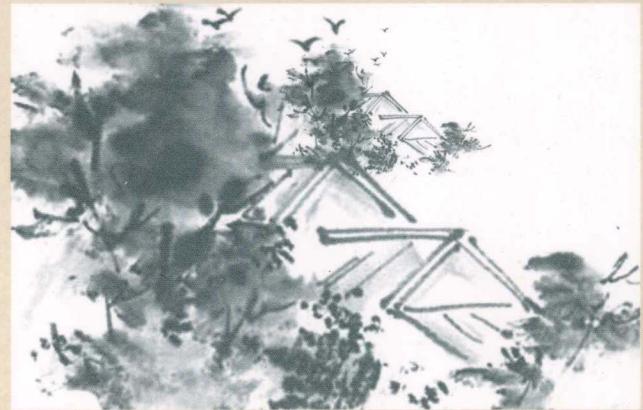


中国哲学史

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唐宋禅学、宋明理学……
中国哲学源远流长，道、气、理、神、虚、诚、明、体、用、太极、阴阳……
凝结着中国历代思想家的大智大慧。
中国哲学史——影响你一生的智慧经典



哲学是智慧的结晶，但它是晦涩而难解的。我们每天都在践行着先哲留下来的哲学，同时也在给后人留下哲学。我们之所以思考，我们之所以存在，这都关乎哲学的命题，我们要立德，我们要向善，我们甚至要建功、立业，我们还要生老病死……这无不是哲学的范畴。也许我们对哲学一知半解，但是连接哲学的故事却是多姿多彩的，它们在给我们解释哲学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美丽的享受。

现在随着这本书，让我们一起走进先哲的心灵宇宙，去体验充满智慧的中国哲学，然后让我们像先哲一样，踏着智慧的光芒享受生活，享受人生。

中国哲学史

郑红峰 / 编

ZHONG GUO ZHE XUE 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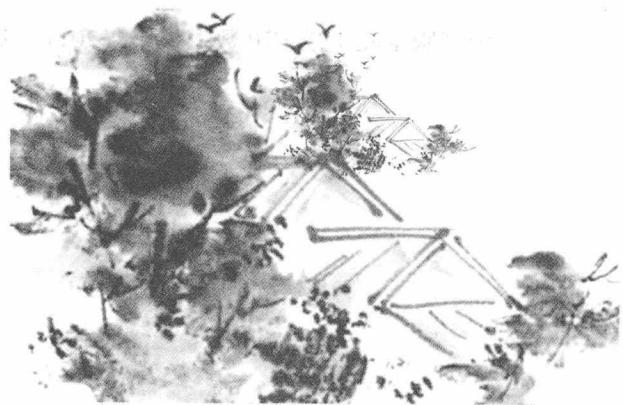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

郑红峰 编

中国哲学史

郑红峰 编



中国哲学史

郑红峰 / 编

中国哲学史
郑红峰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哲学史 / 郑红峰编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2

ISBN 978 - 7 - 5402 - 2577 - 3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哲学史—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4602 号

责任编辑：满 鳌 马明仁

中国哲学史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100054)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施园印刷厂印刷

760 × 1060 mm 16 开 24 印张 437 千字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序言 东方的思想与智慧

中华民族素以悠久历史而闻名于世。在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进程里，我们的先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这当中，中国哲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学习中国哲学，无论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或对于个人的思想素质修养而言都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如何进入中国哲学的宏观殿堂呢？立场不同，路径也就存在许多差异。不过，有一种不可忽略的事实，那就是：此等凝聚着先民生存智慧的传统哲学在相当程度上乃与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假如我们能够通过思想符号中的山水性灵来思索中国传统哲学的内蕴，那将是别有一番情趣的。

今天我们有的专家不承认“中国哲学”或“中国有哲学”，认为中国顶多有“思想”。这些学者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中心主义、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其中有的人根据是“哲学只有一个”，他们把近代以来的欧洲哲学（或者将其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作为普遍的哲学，以此作为“哲学”的唯一范式、标准、尺度，因而不承认非西方的民族有哲学。其实所谓一般、普通的哲学或哲学只有一个，第一是说不分东方西方的哲学，所讲的概念或道理，或哲学中的真理都是普遍的；第二是对不同的族群、不同时空的哲学心态中的共同问题或方法的抽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圣西圣，心同理同。凡是人类各族群的活动，总有一些观念在指导，有些观念是相通的，而且有观念就有普遍性。这是其共性的或是具有可比性、可以通约的方面。另一方面，不同民族的哲学观念是有差异的，哲学观念总是通过具体的民族生命表现的，因而又是特殊的。

哲学是人们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的本源、存在、发展之过程、规律及其意义、价值等根本问题的体验与探求。在远古时期，各个大的种族、族群的生存样态与生存体验相类似又不尽相同，人们思考或追问上述问题的方式也同中有异，这就决定了世界上有共通的，又有特殊的观念、问题、方法、进路，有不同的哲学类型。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几个大的典范文明，各有不同的方式，其哲学有不同的形态。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的哲学是其中的典型。不仅今天所谓中国、印度、西方、中东、非洲的哲学类型各不相同，而且在上述地域之不同时空中又有不同的、千姿百态的哲学传统，并没有一个普遍的西方的或世界的哲学，所有哲学家的形态、体系、思想都是特殊的、各具个性的。

目 录

第一编 三代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哲学

第一章 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之形成	3
一、夏商时期宗教信仰形态	3
二、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4
三、古代的阴阳五行观念	5
四、早期的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	6
第二章 孔子与儒学的发展	8
一、孔子的“正名”思想	8
二、孔子的“仁”与“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	9
三、孔子的认识论思想	13
四、孔子的天命、鬼神论	14
第三章 道家学说	16
一、“小国寡民”与“无为而治”	16
二、“道”生万物的宇宙论思想	18
三、“反者，道之动”的转化思想	19
四、“为道”与“为学”	20
五、庄子对道家思想的发扬	21
六、庄子相对主义的认识论	23
七、庄子的“齐物”思想	24
第四章 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	27
一、孙武“富国强兵”的军事思想	27
二、“知己知彼”军事认知理论	28
三、《孙子兵法》中的战争观念	29
第五章 墨子及其构建的墨家哲学	31
一、墨子的“兼爱”思想	31

二、“天志”、“明鬼”天命论	34
三、墨子的认识论思想	35
四、功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	36
五、后期墨家的逻辑理论	37
六、“循所闻而得其意”的认识论	40
第六章 《易传》与《管子》中的积极思想	42
一、“道”与“器”	42
二、《易传》中的宇宙生成论思想	43
三、管子的政治社会理论和“精气”说	45
四、神秘主义的认识论	47
第七章 战国时期的名家哲学	50
一、惠施的明辨思想	50
二、“离坚白”与“白马非马”说	52
第八章 战国时期儒学的发展	55
一、告子的人性论	55
二、孟子提倡“仁政”及对儒学的深化	55
三、“性善”论和“良知”的认识论	58
四、荀子的社会历史观	61
五、荀子的人性论和“人定胜天”的天道观	63
六、“虚一而静”的认识论	66
第九章 商鞅与韩非的法家哲学思想	70
一、商鞅的社会历史观	70
二、韩非的法治思想	71
三、“缘道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73
四、韩非的自然观	75

第二编 魏晋—隋唐时期的哲学思想

第一章 汉朝初期的哲学流派	80
一、黄老学派及其代表人物	80
二、陆贾的《新语》	80
三、贾谊的哲学思想	82
第二章 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谶纬之学	84
一、董仲舒的政治理论	84
二、“天人感应”的世界观及其认识论思想	85
三、“性三品”的人性论	88



四、西汉末年谶纬之学的盛行	90
五、《白虎通》的唯心主义和天命论	92
第三章 扬雄和桓谭的思想概述	95
一、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	95
二、《太玄》中的哲学思想	96
三、扬雄的辩证法思想可知论的认识论	97
四、扬雄的社会政治思想	99
五、《新论》对谶纬迷信的批判	99
六、“形死神灭”的形神关系论	100
第四章 王充与范缜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101
一、唯物主义的天道观	101
二、反神学目的论的认识论	103
三、王充的进步历史观与命定论	105
四、佛教的盛行与“神灭”论的产生	107
五、《神灭论》的主要观点	109
第五章 王弼与魏晋玄学的兴起	113
一、“无为”乃“名教”之本	113
二、以无为本，崇本举末	114
三、“得意在忘象”	116
四、王弼对“圣人”的理解	117
第六章 裴徽和欧阳建的哲学思想	119
一、对“贵无论”的批判	119
二、裴徽的“崇有论”	120
三、“言”和“意”	121
第七章 郭象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124
一、“独化于玄冥之境”的观点	124
二、郭象的形而上学思想	127
三、对庄子怀疑论的发展	128
四、郭象的社会政治理论	130
第八章 汉唐时期的佛教哲学及其宗派	131
一、佛教思想的传入和盛行	131
二、慧远的禅学唯心主义	132
三、“不真空论”与“物不迁论”	136
四、《成唯识论》与“唯识无境”说	140
五、法藏与华严宗	143
六、禅宗的产生和发展	146

第九章 汉唐时期道教的发展	150
一、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	150
二、葛洪、陶弘景的道教	151
三、隋唐时期道教	154
四、佛道二教的斗争	157
第十章 韩愈、李翱的心性哲学与反对佛教的斗争	159
一、社会和历史背景	159
二、韩愈的“道统论”	160
三、李翱与“复性说”	166
第十一章 唐朝中期的哲学思想	169
一、政治社会背景	169
二、柳宗元的历史进化观点	169
三、无神论思想	171
四、“天与人交相胜”	173
五、对佛教的妥协	175

第三编 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

第一章 李觏的经世致用思想与王安石变法	180
一、李觏对《周易》的研究	180
二、李觏的“礼”	181
三、唯物主义的五行学说	183
四、“性无善恶”论	186
第二章 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	189
一、“气一元论”	189
二、朴素的辩证法	192
三、张载的认识论	194
四、“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	195
第三章 宋明理学的代表——二程	197
一、道学唯心主义的产生背景	197
二、周敦颐与《太极图说》	197
三、二程的理一元论	200
四、二程的人性论	203
第四章 集理学之大成——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205
一、“理一元论”	205
二、“格物穷理”的认识论	209



三、“顺理以应物”的方法	211
四、朱熹对“天理人欲”问题的阐释	213
第五章 陆九渊、王守仁以“心”为本的哲学	216
一、“心即理”	216
二、“易简功夫”的修养方法	217
三、朱陆争论的实质	219
四、“心外无理”、“心外无物”	220
五、“致良知”的认识论	222
六、“万物一体”的修养境界	224
第六章 陈亮、叶适的哲学思想	227
一、陈亮、叶适的功利学派	227
二、陈亮的功利思想	228
三、叶适的唯物主义观点	229
四、对各派哲学思想的批判	231
第七章 罗钦顺的哲学思想	233
一、“理只是气之理”	233
二、罗钦顺的人性论	234
三、对陆王心学的批判	236
四、王廷相的“理载于气”说	238
五、王廷相的人性论与历史进化观点	241
六、对道学唯心主义的反对	242
第八章 王艮、李贽与泰州学派	244
一、明哲保身的认识论	244
二、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	245
三、李贽的主观唯心主义及其对社会政治的批判	247
四、真理相对性的问题	249
第九章 方以智的哲学思想	252
一、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252
二、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253
三、“随”、“泯”、“统”	256
四、对于理学和禅宗的批判	258
第十章 黄宗羲及其哲学思想	260
一、社会背景及对君权论的批判	260
二、以学校为议政机关的政治理想	262
三、“气外无理”、“心即是气”	263

第十一章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	265
一、“气者理之依”的宇宙观	265
二、“日新之化”的辩证思想	267
三、“能必副其所”和“知以行为功”	269
四、抽象的人性论	272
五、进步的历史观	273
第十二章 颜元、戴震的唯物主义思想	275
一、“理气融为一片”	275
二、颜元的认识论	278
三、“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280
四、清初的社会情况及戴震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281
五、唯物主义反映论	284
六、“理存于欲”	285

第四编 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哲学

第一章 龚自珍和魏源的哲学思想	290
一、龚自珍的变法革新思想	290
二、“不拘一格降人才”	292
三、魏源的“师夷之长技”	294
四、“经世之用”的哲学思想	295
第二章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	298
一、原始的社会主义空想	298
二、对封建道统的批判	300
三、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影响	303
第三章 变法维新时期的思想	305
一、康有为的改良主义运动及大同思想	305
二、康有为的进化论思想	310
三、“仁爱”哲学	311
四、谭嗣同的“仁学”哲学	314
五、对封建纲常的名教批判	316
六、谭嗣同的相对主义理论	319
第四章 严复的经验论哲学思想	321
一、宣传民主自由	321
二、《天演论》及其进化论思想	324
三、“质力相推”的自然观	326



四、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328
第五章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332
一、革命民主主义的兴起	332
二、邹容的天赋人权论	335
三、陈天华的英雄史观	338
四、梁启超的哲学思想	340
五、唯心主义先验论	343
第六章 章炳麟的民主革命理论	346
一、对改良派的批判	346
二、对儒家学说的批判	348
三、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	350
四、章炳麟的革命精神与虚无主义	354
第七章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358
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358
二、三民主义	359
三、进化论思想与“突变革命”理论	363
四、注重“行”的知行观	366
五、孙中山的民生史观	370



第一编

三代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哲学

先秦时期的哲学是奴隶社会及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哲学。

公元前 21 世纪的夏代，中国进入奴隶社会，殷商和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中国奴隶社会保留了公社共同体形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土地属奴隶主国家所有，强迫奴隶集体耕作，春秋至战国初，由于铁器和牛耕技术的使用，产生了个体生产代替集体耕作、用地主土地私有制代替奴隶主土地公有制的经济条件，宗族奴隶制在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中逐渐瓦解。

经过长期的反复斗争，战国时期，我国封建制正式确立。

原始社会的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和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也逐渐地积累了一些实际经验，对自然界的一些简单规律、物质现象也有了一些朴素的了解，对客观世界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现实的态度。这可以说是无神论、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萌芽。这一时期除了思想战线上有孔墨两家斗争之外，春秋末年还出现了我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家孙武，在他所著的《孙子兵法》一书中，总结了我国古代的作战经验，包含有丰富的古代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

在奴隶制社会中，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自然界的现像和规律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发展起了初步的自然科学知识。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开始出现分化。考古工作者在山东发掘的这一时期墓葬中，最多的随葬品达 160 件，其中包括贵重的消费品，如玉环等。这说明当时已有了贫富分化。公元前两千多年，我国建立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王朝，从此我国进入了阶级社会。我国奴隶制经过夏、商，到西周时期（约前 11 世纪至前 770 年）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夏代已有了纪年的历法，商代在夏代历法的基础上，已有了每若干年置闰月来调整季节的办法。在数学上商代已采用了十进位，并且有了“规”、“矩”等字，说明了当时数学的发展情况。

西周末年，奴隶制开始崩溃。从公元前 770—前 403 年，史称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改革，特别是铁器农具的使用和用牛耕田，生产力进一步得到发展，同时由于奴隶们的不断起义反抗和大量逃亡，古代奴隶制生产关系已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新的封建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公元前 594 年，鲁国的“初税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承认实行按亩收税的制度，承

承认分封地之外的私田的合法性。郑、齐、晋等几个大诸侯国都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封建地主阶级逐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了优势。也可以说是新的地主阶级第一次得到合法承认，并登上历史舞台。这时在一些诸侯国中，奴隶主为了招徕奴隶劳动力，获得更多的财富，在原有的分封地之外，又强迫奴隶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封建依附关系也开始出现和发展起来。

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和较量，封建制终于战胜了奴隶制，先后建立了魏、赵、韩、齐、楚、燕、秦七个封建国家。秦国实行封建化改革最晚，也最为彻底，商鞅变法的成功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后期的强国，奠定了后来统一中国的基础。封建制度的确立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生产的发展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先秦哲学随之产生和发展。

春秋时期，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斗争十分尖锐。这时奴隶主贵族已经没落，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对奴隶和平民实行了更加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新兴封建地主势力和没落奴隶主贵族势力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春秋时期复杂而尖锐的阶级斗争，推动了哲学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没落奴隶主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竭力鼓吹有意志的天，要人们听从于“天命”的安排。新兴地主阶级及其同盟者小生产者则运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结合本阶级的利益，用无神论、唯物主义反对“天命”论的宗教有神论和唯心主义。这时哲学上的主要代表有：以墨子为代表的，反映新兴地主和小生产者利益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反对奴隶制礼乐制度的思想；以孔子为代表，反映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维护奴隶制礼乐制度的思想。两者之间在这一时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在反对宗教迷信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起来。思想战线上形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条路线的斗争。

先秦哲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中国哲学的萌芽、诸子前哲学和诸子哲学三个阶段：
①萌芽时期。哲学的萌芽是同原始宗教相联系的，主要表现为相信灵魂不死和崇拜自然物的自发观念。在殷商奴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上帝神权观念，周灭殷后发展为天命主宰一切的观念，周公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以《易经》和《尚书·洪范》为代表的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尚未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表现了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幻想的一种联系。
②诸子前哲学。西周末至春秋时期，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出现了危机，天命神权也发生了动摇。在《诗经》中出现了疑天、责天的思想。出现了原始的阴阳、五行观念，对自然界的变化作了某些唯物主义的解释，表现出无神论的倾向，同时发展了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伯阳父、管仲、史伯、医和、子产、晏婴等人，可以称为先秦诸子前哲学思想的主要代表。
③诸子哲学。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是中国哲学进入诸子百家之学的开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中，先后出现儒、墨、道、法、名、阴阳等重要学派，围绕着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以及名实、礼法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哲学论辩，学派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吸取，每个学派内部也不断分化和发展，使这个时期的思想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从而促进了哲学的繁荣。



第一章 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之形成

我国是世界文明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有将近四千年文字可考的历史记载。据考古发掘，中华民族经过了长期的原始社会生活，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

公元前12世纪末，周灭商，为了加强对被征服种族的统治，周奴隶主贵族首先把“上帝”和祖先分开，加强了“上帝”这个至上神的绝对权威，从而提出了“天命”说来论证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周奴隶主贵族所说的德，具体内容仍是“从天命、劝人事”。《尚书·召诰》中说“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这就是说，做国王的要认真崇尚德政，用德行事，才可以求得永保天命。

被称为奴隶社会大圣人的周公旦，是西周初期最著名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家。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发表了一整套思想统治的言论。“天命”说可以说是他炮制的。他不仅提出了“德”，也提出了“孝”，弄出一套制礼作乐的规则。他提出了“天命靡常”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他还提出了只有“保民”才能“享天命”。“保民”也就是告诫统治者要勤于人事，要注意统治之术，好好地保护奴隶不让他们逃亡和失散，才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保民思想的提出，是奴隶起义暴动的结果，是“天”的绝对权威削弱的结果。

一、夏商时期宗教信仰形态

我国进入奴隶社会开始于夏王朝，这时的宗教已经不再是自然宗教，而成为反映社会阶级压迫的宗教。奴隶主贵族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便把原始的宗教迷信加以提高和改造。

公元前17世纪末，商汤灭夏，建立了奴隶制的商王朝。商朝奴隶主贵族，为了加强其统治，炮制了一个天上和人间、社会和自然的最高主宰“帝”或“上帝”，制造了政权神授的谎言，借助这至上神对各种族的奴隶实行血腥的统治。商的奴隶主贵族说“帝立子生商”，这就是说其祖先是“帝”或“上帝”的儿子。实际上也就是宣称他们自己是“帝”或“上帝”的子孙，商最大的奴隶主——王，就是这至上神“帝”或“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

商奴隶主贵族不仅炮制这个最高主宰“帝”或“上帝”。据说，上古时代的“皇帝”，“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即将沟通“上帝”和人间的关系限制在巫、祝、史的手中，而国王就是这些巫、祝、史的首领。

商代人不仅经常祭天祀祖，而且在事事之前都必须进行占卜，乞求降福消灾，如作战、筑城、开河、种获等，都要烧灼龟壳和兽骨，观其裂纹（兆），来预定凶吉，决定行动。商周的宗教迷信是维护奴隶主贵族阶级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它随着奴隶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不断地变换着形式，但万变不离其宗。

二、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易经》中六十四卦是由八卦重叠演变出来的，而八卦又是由阴（--）、阳（-）两爻，排列组合而成的。所以，《易经》是把阴、阳两爻作为两个最基本的“对立”势力来看待的。《易经》中所有卦象的变化都归结为阴、阳两爻的变化。

《易经》中关于阴阳的概括，不可混同于把阴阳解释为阴阳之气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但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最初是在宗教神学的体系下萌芽发生的。《易经》虽属占卦书，但在其神秘的形式中蕴涵着较深刻的理论思维和朴素的辩证观念。例如，它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面，六十四卦由三十二个对立卦组成，其卦的爻象和爻辞反映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大人”和“小人”、吉和凶、得和失、益和损、泰和否、既济和未济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现象；《庄子·天下篇》将其概括为“易以道阴阳”。它还承认对立事物的互相转化。如泰卦卦辞说“小往大来”；否卦卦辞说“大往小来”；泰卦九三爻辞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乾卦九五爻辞说“飞龙在天”；上九爻辞则说“亢龙有悔”，这些都表现了物极则反的观点。从《易经》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萌芽，因而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商周奴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人们开始注意到自然界变化发展和人类社会政权交替、祸福转化等现象。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观察、分析和解释中，人们逐步萌发了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现存《周易》一书中“易经”部分，原是周人问吉凶的卜筮之书，但其中却包含着某些原始而可贵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据《易传·系辞》解释说，八卦作者“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作八卦。所以，《易经》关于阴阳的观念，很可能是在观察天象、地理的变化或人类男女两性、禽兽雌雄的不同中概括出来的。但是，在《易经》中并没有把阴阳作为某种具体事物的两种对立性质，而是把阴阳当做一切具体事物共同的、最基本的两种对立性质提出来的，并用“--”、“-”两个抽象的符号表示。这是由《易经》作为占筮之用的宗教神学体系决定的。

《易经》中所包含的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是十分可贵的。但是，他把事物的“对立”和“转化”抽象化、神秘化，认为人们对于事物的变化发展是无法认识和驾驭的，而只能乞求于神的启示，然后再来决定人们的行动。

《易经》中关于“对立”的思想，也反映在某些卦象相反的卦的吉凶对立上。在早期的《易经》中，虽然还没有将一些相反的卦编排在一起，但从它对一些卦象相反的卦的卦辞中所下的凶吉判断，也可看到某些“对立”思想的萌芽。如泰卦和否卦，两卦的上下卦象恰好相反，是两个对立的卦。《易经》在一些卦中，包含有一些由低向高的变化发展思想和“物极必反”的思想。如乾卦，初九的爻辞为：“潜龙勿用。”九二的爻辞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的爻辞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的爻辞为：“或跃在渊，无咎。”九五的爻辞为：“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的爻辞为：“亢龙有悔。”

周人运用六十四卦以判断吉凶祸福及其变化，祭祀、战争、商旅、婚姻、生产等事情的吉凶祸福，则均视六十四卦中阴阳两爻的变化而定。这也就是说，自然界和人



类社会的变化，最终归结为阴、阳两种势力的消长。这正是最原始的关于“对立”面及其变化的思想。《易经》在描述由低至高的变化发展情况中，也表露了一些转化的思想。以上述乾卦为例，它在讲由低至高的发展中，“龙”由“潜”到“飞”都是吉利的，然而到了上九，则亢龙“有悔”了。这是说，发展到了顶点，就会由吉变凶，转向反面。这里多少包含着一些“物极必反”的辩证法思想的萌芽。

因此，《易经》的这些朴素辩证法思想因素，带有严重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易经》中关于阴阳对立、“物极必反”的思想，晏婴的“相济相成”的思想等，虽然都还是十分简单，只是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一些萌芽，但在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进程中，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三、古代的阴阳五行观念

经过世代的创造，商代已经有了文字。从殷墟中发现，甲骨文已有三千多个单字，这些都是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奴隶社会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天”在地上的代理人——天子权威的下降，“天”、“上帝”、“鬼神”的观念也逐渐动摇，在自然知识积累和阶级斗争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萌芽。

商周时期，虽然奴隶主贵族所宣扬的宗教迷信占统治地位，但由于生产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推动，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也在向前发展。冶铸技术的提高及青铜器的广泛使用，生产工具有了很大的改革。天文历法的推算及计算方面的需要，使商周人都掌握了一定的数学知识，已经从整数的计算发展到了分数的计算。

阴阳五行观念的产生，是和当时的生产实践和积累的自然知识相适应的，但它还不是建立在正确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的。特别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很低下，人们的自然知识很狭窄，再加上提出这些观点的人，又往往是贵族出身的史、巫等，因而它有很大的局限性，带有很大程度宗教迷信的色彩。

“阴阳”说是在观察天文气象、时节变化的基础上萌发的。周人用两种不同性质的阳气和阴气来解释四季的变化和万物兴衰。他们认为，阴气的性质是沉滞下降的，阳气的性质是蒸发上升的，这阴阳二气相互协调，配合有序，流转正常，就风调雨顺，否则就要发生灾难。周幽王时的伯阳父，曾用阴阳二气的失调来解释当时在今陕西地区发生的地震现象。他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这就是说，阴阳二气的流转是有一定秩序的，如果发生秩序紊乱的现象，就要产生地震。这种观点之所以被称为朴素唯物主义或唯物自然观的萌芽，是因为它用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或猜测去解释自然现象本身的规律性。这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帝”、“神”、“天命”的唯心主义观念是完全对立的。

在中国古代众多哲学流派中，阴阳五行学说最为引人注目。它是李约瑟所谓的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有机论自然观的重要表现形式。它所蕴涵的一些思想是可贵的，但在某些方面又阻碍了传统科学的进步。

阴阳学说认为构成万事万物的要素中有两种对立的本原，它们可以分别名之为阴阳，阴阳双方的矛盾运动构成事物的发展变化。而五行学说则认为世上万物是由金、

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组成的。这五种元素相生相克，以土为主，分别与另外四种元素“和”成万物。它们之间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就会在自然界和人类中产生变异和灾难。阴阳学说在我国起源很早。盘古开天地的神话就包含了原始的阴阳学说的思想，西周末伯阳父以阴阳说解释地震，标志着阴阳学说的正式形成。五行说的形成还要更早一些。原始的五行思想产生于古人治水斗争的壮丽实践，后来到了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提出了“同则不继”、“和实生物”的观点，对五行生物的原则作了论述。

《尚书·洪范》中则对五行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段话简要描述了五种构成世界最基本的物质形态的性质和作用。它与伯阳父的解释一道，使五行学说脱离了其原始状态。后来，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进一步融合，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哲学思想。古人认为，天属阳，地属阴，两者相互作用，产生金、木、水、火、土五行。“最先出现了属于阴的水和属于阳的火，然后出现了其中阴略占优势的木和其中阳略多于阴的金，最后出现了阴阳两种本原达到一定平衡的土。阴阳两本原继续不断相互作用就进一步产生了自然界形形色色的万物。”阴阳和五行两种不同的学说就这样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

阴阳学说包含着很可贵的辩证法思想。世界万事万物由阴阳二气化生，排除了神的作用，是它的唯物性；阴阳二气的排斥、转换构成了万物的发展变化，讲的是矛盾运动，体现了它的辩证性。

史伯虽然认为，土与金、木、水、火相杂以成万物，但他又搬出了先王，先王成了造物主了。伯阳父把地震发生的最终原因归结为人事，并以此论证周王朝将要覆亡。这就把自然的规律神秘化了，最后就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宗教迷信的唯心主义那里去。商周时代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萌芽有这么大的局限性，这是由当时各种历史条件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当时有对世界万物由“五行”，即五种物质元素构成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据《国语》中记载，西周末史伯对郑桓公的一次谈话中说，“和”则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一种元素和另一种元素掺和，就能产生新的东西并得到发展，假如用同一种元素相加，则既不能生物又不会有发展。从这个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史伯把金、木、水、火、土作为构成万物的五种元素，这不能不说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

四、早期的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

春秋之时具有无神论倾向的有一个郑国的子产（公孙侨），他最早公布了刑书，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先驱。他在驳斥对星辰出没的观察而断定郑国将发生大火灾时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寇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天道和人道是对立的，天道是虚无缥缈的，人道才是切近具体的，只有用人道来解释吉凶祸福才是合理的，可信的。

当时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人和神的关系，不仅认为人是神之主，而且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还要把神完全驱逐出去，这样人的地位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春秋末